

中共党史资料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40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D239/6:2

803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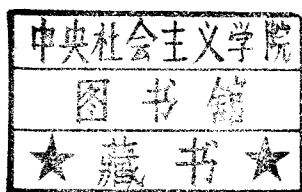
中共党史资料

第四十辑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



200041622

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2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71 号

中共党史资料(第四十辑)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

出版发行：中共党史出版社

(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清华大学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7.735 印张 141 千字

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5000 册

ISBN 7-80023-271-9/K · 291

定 价：3.50 元

DH4408

目 录

文 献

论敌后抗战 聂荣臻 (1)

回 忆 录

北伐和南昌起义 (下) 李一氓 (8)

接管沈阳记事 李 锐 (30)

我的革命生涯 张庆孚 (72)

战斗在胶东抗日战场的日日夜夜 王 彬 (90)

日记摘登

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日记 汪东兴 (124)

人物介绍

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传略

……………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(145)

专题资料

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

斗争情况 …………… 闽粤赣边区党史办公室 (156)

中共组织史资料

五大至六大期间东北三省党的组织

状况 …………… 赵 朴 (198)

《中共党史资料》(1—40辑) 目录索引 …………… (208)

论 敌 后 抗 战

(1943 年 10 月)

聂 荣 臻

华北敌后之抗战，迄今已六年多，斗争之残酷实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。就华北之一角——晋察冀边区而论，其尖锐复杂而剧烈之斗争形势实远处大后方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。迄抗战六周年为止共计作战 17450 次，共毙伤俘敌伪 235364 人。我亦伤亡 64670 人。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。

几年来敌我在武装斗争方面，曾经过许多发展与演变，1938 年武汉陷落之前，敌人即已开始对我举行进攻，屡次集结优势兵力，以正规战术作战，攻我一面（如阜平、涞源等地）。武汉会战之际，敌同时大举进攻我五台、阜平，且将“扫荡”华北与进攻武汉相提并论；在战术上改取分进合击的数路“围攻”方式，然仍未脱离机械的军事教条之束缚。我以游击战、运动战相辅与之对抗，因之使敌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，而常于扑空之余，遭我痛击。1939 年，敌则集结相当优势兵力为一路，采取“长驱直入”地袭击我之中心地区（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

等役)，但均遭受歼灭性之打击。进攻陈庄之敌，全军覆没。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则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，就是敌寇所谓“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”。敌屡次惨败，故自1940年起，乃实行所谓“极度分散配备”，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，以冀窒息我军。奈兵力既感不足，再加分散配备，则弱点愈多。1941年百团大战展开后，不仅敌在山地若干据点被我拔除，即沿铁道封锁据点亦均遭我猛烈破坏。我在战术上不仅展开广泛游击战，而且局部地展开对敌阵地之攻击。于是敌之分散配备亦告失败。乃复调集大的兵力“分进合击”，向我大举“扫荡”，并一度侵占我阜平。但在我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打击之下，使侵占阜平之敌于弹尽援绝之后，狼狈逃窜。

1941年敌酋冈村宁次鉴于既往之失败，乃谋改弦易辙，实施所谓“铁壁合围”战术，以中条山与晋察冀为全年两大战役进攻目标。经长期之准备，企图先荡平中条山根据地，截断敌后我军与主力之联系，结束后，立即转其凶锋指向我边区。战斗一经开始即分十数路直扑而来，山沟小道，无所不至，反复“围剿”，在战术上则与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”并用，杀戮焚掠，凶残无比。然经我将士之浴血抗战，迭挫敌锋，纵敌酋冈村亦不得不承认失败，并谓：“荡清八路军，非短时间所能奏效”。而只得以“狮子扑鼠，效力不大”等遁词聊自解嘲，其窘态可想见矣。之后，敌复强调“高度之分散配备”，增筑碉堡及

封锁沟墙，其密度几至逐村皆是。封锁既成，乃实行其对我根据地之“蚕食”政策。直到今天，“蚕食”政策亦经多次演变。初则“步步推进”，继则“分区扫荡”，“分割蚕食”，以达其“蚕食”之目的。1942年对我冀中区之“扫荡”战，即属此种性质。然敌此种紧缩“蚕食”之目的，至今虽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，且亦将永不能遂其所欲。至其分散配备之结果，愈使敌军兵力分散，由之纪律废弛，其腐化，堕落，厌战，反战之情绪亦随之增高，战斗力亦日趋低落。如此，我军纵在堡垒如林，沟墙如网之广大战场上仍能纵横驰骋，游击战争之火，更广泛燃烧于敌占区。变敌后为前线，远近交攻，敌我交错，我之前锋更早已越长城榆关而插入伪满边境，震撼敌人之心脏。战局之发展将益增敌寇惶恐，而促其败亡。

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，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，而且表现于政治，经济，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。自1941年起敌即开始其所谓“总力战”，此“总力战”之表现最显著者，即敌寇所进行之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自1941年起，前后已举行六次之多，其中心则各期不同。就我边区而言，敌寇在其“治安强化运动”中，集中于人力物力之抢夺，及政治上思想上之诬蔑造谣，企图达到其“以华制华”之目的。敌以兵力不足到处抓捕壮丁，扩编伪军，充实守备兵力。现敌占领区大部分均由伪军防守，此等伪军一部分为失业或流亡者之集团，敌寇本拟利用之于一时，结果多与愿违。而今敌寇去之不能，欲“肃”之又不胜其

“肃”。若干地区，如大清河以北，与其说是敌寇“治安区”，毋宁说是伪军统治地。另一部分伪军，则大部为农村之壮丁，被强迫捕捉而来，他们既无战意，又无战力。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，敌寇必败之势日渐明显，造成伪军普遍动摇，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，然不得不利用之于一时，此乃其严重之危机。敌寇对物力之掠夺，乃图达成“以战养战”之目的。敌曾以“开发资源”、“确保农产”、“勤俭增产”等类口号相号召，但实际上敌寇之所为，适得其反。敌寇到处挖沟筑堡，强占与毁坏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几；而苛捐杂税，勒索掠夺，层出不穷，加之壮丁之被捕走或逃亡，致使敌占区农村或有地无人耕，或有人无地种，或有人而无心耕，终至“增产”成为空言，经济之危机日趋严重；而我方对敌之经济封锁，更使敌寇之经济困难有加无已。日寇明知敌后人民与之尖锐对立，乃极力进行所谓“思想战”，宣扬所谓“皇道精神”，所谓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，但“七分政治”之一切欺骗假面具，早被其“三分军事”之残酷暴行暴露无遗。“三光政策”之下，遍地血腥，使广大中国人民益增与敌不共戴天之深仇。数年来，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，涌现众多民族英雄，其惊天动地之壮烈事迹，传遍人民之间，记不胜记。于是敌寇“思想战”亦宣告破产。此外，敌寇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，破坏我军民关系，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，更无一日放松，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。我们回答敌人的，却是更千百倍地提高了我们的警惕，肃清了各种潜藏的第五

纵队分子，加紧抗日阵营的团结，粉碎敌寇的阴谋。

六年余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战争是无情的，不战不能存，不战更不能胜。我军采用之战术基本上为游击战，但此种游击战决非等闲的“游击战”，更非一般墨守战术教条者所可比，也不是仅守过去游击战争的“老一套”经验。游击战术发展至今日，乃是在既有的战争经验基础上，再从六年余抗日战争中，不断获得新的经验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。斯大林说：在战争中不进步者即将为敌人所击败。这虽指现代最优良之军事装备与作战技术而言（我们固然没有现代化优良装备），但我之战术，必须适应我现有装备而力求改进，其理则亦相同也。

（一）我民族自卫战，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，为军事，政治，经济，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，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，决难取胜。尤以我军远处敌后与大后方断绝，得不到任何补充，仅凭简陋之武器与强敌周旋，若忽视各种斗争之配合，则不仅我军事上不能取胜，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。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，对我正义之保卫战，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。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，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，以求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。

（二）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，给人民以民主自由，改善人民的生活，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，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，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，否则孤军苦战，必难获胜。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有全国总动

员之号召。我们坚持敌后抗战，六年来恪遵此种号召，认真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，故能坚持敌后作战以至今日，且将继续坚持下去，直到最后胜利。

（三）团结乃战胜敌人之唯一武器。军队与军队间，军队与人民间，均应以抗战第一，胜利第一为目的；消除任何不团结的现象，反对任何减削自己力量的行为，不予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。

（四）坚持敌后战争，必须创立赖以凭依的根据地，作为战略基地，以遂行独立作战之战斗任务。无论武装部队，地方政权，民众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等设施均必须有完善具体之整套办法，更须完全适合敌后斗争之环境，不能囿于成规，固守旧习，如不明此理，武断专行，否认各种建设，则抗战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，都不过徒托空言。我晋察冀边区行政当局不仅有其各种设施维系敌后人心，团结广大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之下，获得温饱，并使敌占区同胞心向祖国，精神上有所寄托，其作用亦非常巨大。

（五）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，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，这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，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。我们所坚守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精神，不但为大多数人着想，也为少数人着想，更为全国人民抗战利益着想。

（六）在敌后作战之部队有成功者，有失败者，因此，我们就必须有严正之赏罚制度；虚心检讨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，得出经验教训。如果是赏罚不明，墨守成规的军队，

纵令其有充裕之补给与优越之装备，仍不免要遭受不必要之损失，这种事实，不可不使我们深刻反省。

当此总反攻时期愈形接近之今日，胜利虽已在望，而今后之困难亦必更多，敌后斗争之艰苦程度更将十倍于往昔。因此，我们亦必须以十倍于往昔之努力以支持日益艰苦的敌后斗争。我深切的期望今后我不倦战斗之敌后部队能获应有之补给与援助；更望全国各党各派全国军民能够真正亲密团结，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反攻，驱逐日寇出中国，使民主和平之新中国得以早日实现。

（责任编辑 刘昌亮）

北伐和南昌起义（下）

李 一 氓

（六）

我带着总政治部的先遣队，由九江乘轮船先到南京。这个先遣队大约 30 多人，其中多数人对南京、上海比较熟悉，如社会股长袁文彬，就是上海同文书院的学生，松江人。到南京后，正碰上第六军的程潜（字颂云）、林祖涵（即林伯渠），他们要去上海，要了一列专车。我就想法加挂一辆二等客车在他们专车上，把先遣队全部带到上海。到上海后，我们在高昌庙制造局路找着一幢大房子，就安营扎寨，宣布总政治部开始办公，时间大约在 1927 年 3 月底，地址在西门斜桥路制造局路 164 号，是间小铺面。4 月 4、5、6 三天，连日在上海各大报纸发了通告，并附有一个电话号码（这个制造局路，现在还在，最近我去看了一下，但已找不着那幢房子）。这时政治气候已有点变化莫测的样子了。从“中山舰事件”以来，蒋介石是怎么一回事，不仅值得怀疑而且是大可怀疑了。到了上海，接上党的关系，找到周恩来同志，他是当时在上海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。我报告了总政治部这次行动的安排：我是先遣队，郭沫若主任率

本部随后就来。他指示我们，在郭沫若到达以前在上海各报以广告形式登载总政治部署名的标语，召集到沪部队政治部开会，组织欢迎汪精卫的工作。按照上述精神，我们从4月1日起，每天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半个版面的政治标语广告，用的名义是“总政治部”。标语的内容和次序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。4月1日是“建设革命的新上海”；4月2日是“打倒帝国主义”；4月3日是“肃清奉系军阀”；4月4日是“铲除封建势力”。自4月5日起还将署名改为“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布”。总政治部原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，现加上“中央军委”，意即这个总政治部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，这就摆脱了蒋介石。4月5日的标语是“欢迎汪精卫同志复职”，从前四天的属于外部斗争的口号，转为内部斗争的口号。4月6日是“一切权力属于党，党权高于一切”。就在同一天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，亦以与我们同样大的版面，刊登了“欢迎我们的领袖汪精卫同志”的标语。

4月5日上海《申报》刊登了一则消息，标题是“各级政治部人员联席会议”。这则消息说：“昨日下午2时，总政治部召集驻沪各级政治人员，假上海特别市党部三楼开联席会议。到会者有第十二师政治部、二十六军政治部、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、总政治部、第二十二师政治部，及驻沪各军师以下指导员、党代表共300余人。由总政治部秘书长李民治主席，宣读遗嘱，后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，请愿蒋总司令释放蒋有谅，并讨论发起欢迎汪主席大会，至

此遂由主席宣布散会。”

我们4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以准备欢迎汪精卫为主，地址在上海西门林荫路；李民治是我当时的名字；遗嘱指孙中山的遗嘱；二十六军即周凤岐军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即白崇禧部；至于十二师、二十二师的负责人是谁，每个单位的主要参加者是谁，要求蒋介石释放的蒋有谅又是谁，为何被蒋拘捕，欢迎汪精卫的具体作法是什么，已经回忆不起来了。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日，上海特别市党部又通知于5日召集上海各机关、团体包括驻沪各部队政治部在内，在市党部开会，讨论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的事宜。当时我们的工作中心是支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所谓国民党左派，借以对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极右派。其实对汪精卫也缺乏认真的了解，而是无端轻信。从《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》（4月5日）开始，政局就一步一步地变得难以挽救了。我不想当事后诸葛亮，我当时是24岁的小青年，对形势的认识，也是模模糊糊的。

4月6日下午，周恩来同志在工人纠察队队部（湖州会馆，今会文路中兴路，已毁于抗日战争，现新建铁路职工宿舍），召集到沪各军全体党员开会，总政治部的党员都去了。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的人，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。会议主要内容是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部队里的同志应该怎样工作，但具体的情况已无从回忆了。会议大概下午3点钟开始，6点以后才结束。4点钟左右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我们的一个同志匆匆跑来，报告前敌总指挥部刚才的一

个可疑行动，即该部派出一个连，乘4辆汽车，全副武装匆匆离开指挥部，去向不明。可能是要捉什么人。恩来同志听后，默想了一会儿，判断说：“可能是两个地方：一是什么地方，我不告诉你们；二是你那里。”他说“你”的时候，把手指了指我。他要那个同志立即回去，如有新的情况，马上来报告。然后，仍然主持会议继续开下去。临散会时，恩来同志又重复指着我说：“你回去时小心些。”会场距制造局路不太远，我们是走路回去的，我把同志们分为四起，一起两三个人，互相间保持一段距离。约定：第一起走到近164号时，要十分注意，先不要进去，可通过大门前面，看大门里是何情况。如有异常现象，可折回来报告。在将到164号时，已发现大门前的汽车，有个同志沿大路前行，通过大门前面，看见大门里电灯全开，断定总政治部已出问题。遂决定大家立刻转进租界，当地有亲朋好友的借宿一宵，没有办法的去住旅馆。同时指定两个联络人员，某个人联系某几位同志。我决定去一个朋友家里，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两个联络员来找我。

第二天一早，翻看《申报》，果然有一则标题是“总政治部昨日被封”的消息：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，以总政治部本属于总司令部，惟该部到沪多日，并未向总司令部报到，擅自在外发表言论，认为反革命分子。特于昨日下午令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派队发封。总指挥部奉令后，即派兵一连，于下午四时，分乘汽车四辆，前往制造局路，将该总政治部发封，并逮捕办事人员。该兵士一连，于下午

六时许回总指挥部呈报。详情待续。”

罪名两条，第一没有报到，即是用国民党中央军委的名义，没有用他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名义；第二是擅自发表言论，即刊登那些大标语，伤害了蒋委员长，断语是“认为反革命分子”。这完全是蒋介石的逻辑：“我蒋某是革命的，反对我就是反革命。”事情明摆在那里，已无法工作，经过请示恩来同志，决定除我外，其余同志都折回到安庆一带去找郭主任报到。他们很快就都离开上海了。对 19 个被捕的工作人员，因为全是国民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，没有一个共产党人，所以关了不到一个月，就全都释放了。这次最幸运的是预先有个前敌总指挥部出动一连武装的情报，使我们有所警惕，所以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被捉到。

4 月 8 日，《申报》又刊登了一则消息，标题是“总政治部被封后新闻”。消息说：“高昌庙制造局路之中央总政治部，前日下午被蒋总司令下令总指挥部，派兵一连前往发封，并逮捕办事职员，各情已志前报。兹悉该部发封后，并捕获办事人员十九名，内有两名系妇人，即晚押解龙华总指挥部营房内，一面呈报蒋总司令办理。昨据总指挥部办公处潘主任云，此十九人尚非重要人员，现一面派员往各处调查此十九人之行为如何，若非十分严重者，即可由负责之人担保开释，从轻发落云。”

白崇禧奉蒋命令的行动，目的在于对付总政治部这个机构，对付总政治部的共产党员，更主要的是要捉拿我。消息上说“尚非重要人员”是很含蓄的。事后若干年，我在